

新地緣時代來臨及其戰略意涵

The Coming of a New Geopolitical Era and Its Strategic Implication

蔡東杰

壹、地理變數與大戰略

如同 James Fairgrieve 在 1915 年《地理與世界霸權》(*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*) 書中強調的，地理因素對人類活動與歷史之影響不言可喻。當然，不可否認其中存在的乃是種雙邊雙向關係，亦即地理要素雖經常對人類活動發揮支配或限制作用，但人類憑藉思考、行為與勞動等，也愈來愈多地產生「改造自然」乃至「人定勝天」的結果。進言之，地理空間與生態環境對人類生活內涵之可能性設定了基本框架，至於人類在此種限制下的選擇範圍，則取決於地理環境與當時人類技術水準之間的相互關係，以及人類在各個特定時期下的社會穩定性與生活重心。

從影響面向言，地理對人類的選擇首先凸顯在經濟生活上，所謂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」，正是這個意思。其次，則是人類的彼此鬥爭過程；例如《孫子兵法》便云，「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」，日耳曼兵學家 Karl von Clausewitz 在《戰爭論》(*Vom Kriege*) 書中談及攻擊與防禦時，也非常重視地理因素所扮演的關鍵地位，至於普魯士領袖 Frederick the Great 更直言，「地理知識之於將帥，猶如算數規則

之於數學家，將帥若不通地理，必然遭致嚴重後果」。除了前述經濟生活與戰爭外，地理的影響還包括人類對於追求集體生存發展之最宏觀規劃，亦即大戰略（*grand strategy*），對此將於後面詳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理雖長期影響著人類的生存抉擇，畢竟屬於某種客觀靜態變數，相對地，隨著文明程度持續進展，尤其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，人類不僅逐漸掌握更多的主動性，甚至憑藉新科技所帶來「移山倒海」之改變能量，乃至無處不至的長程投射能量與穿透力，地理變數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，一度遭普遍質疑。例如 Colin S. Gray 便曾言，「在科技影響下，地理最終成為似是而非的謬誤」，但這顯然並非共識，例如 Jakub J. Grygiel 依舊堅持，地理「不過是被遺忘罷了，而非被征服」。

本文雖不擬涉入前述辯論，至少個人始終認為，不僅地理因素從未被決策過程所忽略，更甚者，看似靜態被動的地理，往往由於主要行為者之主觀見解，以及主要行為者彼此結構特性與互動模式之改變，不斷成為形塑新地緣時代之環境背景，以及各國構思大戰略時之制約來源，這點絕不能被忽略。

貳、世界島及其地緣意義

自從歐洲透過十六到十八世紀的地理大發現，奠下了今日「全球化」基礎後，所謂世界島（*the World Island*）便成為大戰略的思考核心。

從地理層面看來，世界島意指由歐亞（*Eurasia*，包括歐洲、中東、東亞與南亞）與非洲所共同組成、佔全球陸地面積近六成的單一巨型大陸（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歐洲不過是位於此一巨型大陸左側之超大半島），從它經常也被稱為「舊大陸」（相較於美洲、澳洲與

南極洲等「新」大陸) 看來, 此處事實上也是歷史上人類活動最集中、最持久且累積成果最多的一個區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 首先, 儘管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後, 日益增長的信心讓歐洲決定將自己「獨立」出去, 但它始終沒有忘卻過自身的邊陲性, 以及來自世界島心臟地帶 (Heartland) 的壓力; 其次, 作為近代全球化之主要推手, 並作為十九世紀以來的文明與權力中心, 歐洲卻奇特地並未成為以全球作為投射範圍之大戰略的思考起點, 相對地, 美國海軍史學家 Alfred Mahan 在 1890 年出版的《海權對歷史之影響》(*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*), 則可說是第一本重要著作。

Mahan 一書論述的歷史範圍, 一方面起自英荷戰爭萌芽之 1660 年, 更重要的是, 終點乃是美國獨立戰爭正式結束的 1783 年, 充分顯示「為美國利益服務」之寫作目的, 由此亦指引了大戰略思考迄今的「國家本位」特質。據此, Mahan 所謂「任何國家或同盟若能擁有位於中央之戰略位置, 並憑藉足夠之海軍實力與堅定之遠洋戰略以控制海洋, 就能控制世界財富, 進而支配全世界」的說法, 一方面既明顯是配合美國地理現實所進行之理論「量身訂做」, 也凸出了美國因隔了兩大洋以致遠離世界島, 因此處於絕對地緣困境之可能焦慮感; Mahan 暗示的是, 若美國選擇消極地留在新大陸安享天命 (Manifest Destiny), 而非更積極透過發展海權以接近世界島, 最終將無法避免被邊緣化的結果。

無論如何, 相較 Mahan 試圖勾勒出「美國的大戰略」藍圖, 英國地理學家 Halford Mackinder 隨後在 1904 年發表的〈歷史的地理樞紐〉(*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*) 一文, 則不僅努力地希望「為英國利益服務」, 也首度提出了所謂「世界島」概念。其中, 他「不

無憂慮」地把內亞地區（過去由匈奴或蒙古等游牧民族控制，如今則由俄羅斯取代前者地位）視為某種地理「樞紐」（pivot）或「心臟地帶」（heart-land），據此得出「控制東歐便可支配心臟地帶、控制心臟地帶便可支配世界島、控制世界島便可支配全世界」的結論，¹並警告若世界島的大部分被置於某種單一控制之下，憑藉其所整合之陸地與海洋資源龐大基礎，最終可能帶來一個無可抑制的「世界帝國」（world-empire）。

儘管 Mahan 從「哥倫布時代」歷史經驗出發，並以十七世紀以來歐洲控制全世界與英國爭霸歐洲為例，試圖證明海權之戰略重要性的說法，曾由英國外交官 Eyre Crowe 在 1906 年所提交的一份備忘錄（*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*）中獲得支持，英國亦似乎一直以發展海軍並藉此控制海權作為戰略思考核心，甚至還有人認為，真正理解並接受 Mackinder 理念者，乃德國軍事學家 Karl Haushofer，後者間接啟發了納粹時期的世界觀與大戰略方向，²無論如何，這並不意味著英國完全無視於 Mackinder 的地緣政治論點，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之間，英國從中東、波斯、阿富汗、新疆、西藏乃至中國內地，³與俄羅斯所進行一系列戰略博弈看來，事實上，早在 Mackinder 試圖提出相關概念之前，英國或已根據某種「本能反應」，將此概念落實到針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規劃當中。

¹ 事實上相關概念在 1919 年《民主的理念與現實》（*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*）書中，才更趨於成熟完整，但 Mackinder 從未使用過 geopolitics 一詞。

² 例如由德國聯合義大利、日本所建構之軸心勢力（Axis Powers）及其戰略規劃，便有共同控制樞紐（心臟）地帶之暗示與意圖。

³ 英國在 1874 年介入由阿古柏領導的新疆獨立運動，1888-1904 年入侵西藏，以及 1898 年後介入中國境內勢力劃分風潮等，部分概念均有間接平衡俄國之意味。

參、冷戰結構及其遺緒

Mahan 雖為美國量身訂做提供了第一份大戰略概念，從當時世界正處於歐洲帝國主義高峰的背景看來，其構想毋寧是「在積極中帶有消極成分」的，積極處在於，Mahan 企圖激勵美國從海權面向切入，加入當時的全球擴張浪潮當中，至於消極處則如前述，或許也反映出某種被邊緣化的不安全感。值得注意的，一來美國並未因此受限於前述觀點，更甚者，隨著美國能量逐步上升，其戰略視野亦慢慢追上歐洲的主流腳步，將視線投注到世界島上。

例如早在二次大戰前夕，Nicholas J. Spykman 便於 1938 年一篇論文〈地理學與外交政策〉(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) 中指出，相較於經濟程度與領導人性格等因素，地理因素對於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更持久，接著，他在 1944 年《和平的地理學》(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) 書中又進一步提出，領土的地理特質將直接影響國家維護安全的方式，致使空間在國家互動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；至於在宏觀視野方面，Spykman 則改編了 Mackinder 的地緣區分標準，將全球陸地切割成心臟地帶(歐亞大陸內側)、邊緣地帶(rim-land, 美洲與歐亞大陸發生接觸之地帶，亦即 Mackinder 理論中，位於心臟地帶邊緣的「內新月形地帶」、離岸島嶼與大陸(off-shore islands and continents, 即 Mackinder 理論之「島嶼大型陸地」和「外新月形地帶」)等 3 部分。

除區隔標準之外，相較 Mackinder 強調應控制心臟地帶，並認為離岸島嶼與大陸是圍堵心臟地帶的關鍵，Spykman 則認為支配心臟地帶無助於制霸世界，同時更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，並據此主張新世界(美國)必須支配邊緣地帶或與邊緣地帶結盟，才是最佳戰略選擇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早在 1920 年代，當時的波蘭統治者 Josef Pilsudski 便曾提出過所謂「普羅米修斯計畫」(Prometheism) 和「海間聯邦」(Intermarum) 等地緣戰略構想，其要旨在於，歷經沙皇統治與蘇維埃化後，俄羅斯(蘇聯)已成為最主要的歐亞心臟地帶強權，但因其能力依舊不足，且西部存在地緣缺口(東歐大平原)，因此需要緩衝區來保障自身安全，這也是它屢屢向波蘭伸手，二次戰後更全力向東歐擴張的緣故；相對地，為防止自身成為蘇聯安全戰略下的工具甚或犧牲品，波蘭則希望能建立一個更團結獨立的東歐勢力來加以因應。事實上，前述想法不僅與冷戰初期美國駐蘇聯外交官 George Kannan 的見解頗為類似，後者也依此為美國建構了「圍堵」(containment) 戰略之思考基礎。

進一步來說，「圍堵」之目的乃為了保障西方不受心臟地帶強權之威脅，至於美國自 1950 年代以來的具體規劃，則大致結合了 Spykman 和 Kannan 的戰略構想；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(NATO)基本上反映了 Kannan 的見解，在此之外由各種雙邊與多邊同盟共同編組的一系列圍堵網，⁴則不啻實踐了 Spykman 對於邊緣地帶之重視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無論將其視為美國戰略的成功，抑或因為美國在二次戰後確實具備無可匹敵之能量與地位，在接下來的冷戰(Cold War, 1947-1991)時期中，由於呈現「小秩序或有動盪，大秩序基本穩定」之結構特徵，大規模衝突之暫時遭到「凍結」既增長了人們對於維持和平現狀之信心，在不安全感因此降低同時，加上前述因科技跳躍進步所帶來無遠弗屆之投射能力，地理因素一度似乎被淡

⁴ 例如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，包括美澳紐公約(ANZUS, 1951)、美日安保條約(1951)、美菲聯防條約(1952)、美韓共同防禦條約(1953)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(1954)、東南亞公約組織(SEATO, 1954)等一系列雙邊與多邊安排，以及位於中東地區的中部公約組織(CENTO, 1955)。

忘在主要決策考量之外。

儘管如此，情況在二十世紀末似乎出現某些轉變跡象。

肆、新地緣內涵之浮現及其討論

當然，目前論斷美國霸權的「絕對衰落」為時尚早，不過，美國對國際關係影響力「相對比例」下降或為不爭事實（例如其 GDP 佔全球比例從 1950 年代將近 50%，降至 2015 年僅約 24%，國防開支佔全球比例也從 1950 年代近半成降至 2016 年約 36%，目前雖仍為第一大經濟體，但 2013-15 年間曾一度被中國擠下成為第二大貿易國家）。如同周知，即便以美國霸權地位看似無庸置疑的冷戰時期為例，由體系內涵從 1950 年代「緊密兩極」到 1970 年代所謂「鬆散兩極」的發展，便可一窺美國國際地位之某種線性演進。尤其在進入新世紀後，無論朝 G2 或更廣泛之 G20 讓渡，美國霸權地位之未來，絕對是觀察下一階段全球結構變遷與國際關係發展的重中之重。

早在 1997 年，Zbigniew Brzezinski 便在《大棋盤：美國的優勢及其地緣戰略責任》（*The Grand Chessboard: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*）一書中，提出以下大哉問：「美國的全球霸權雖史無前例，且迄今並無對手，但它是否就此能高枕無憂，從此不受挑戰？」在他看來，歐亞大陸才是全球地緣政治的「頭獎」，至於美國以一個非歐亞國家竟能獨佔權力鰲頭，既可能不過是個短期現象，其未來更攸關世界和平發展，加上美國擁有「民主政治不利於進行帝國式動員」此一致命傷，為求未雨綢繆計，他建議美國必須付出更大心力去關注歐亞大陸上關鍵行為者之變化，並擬出相應之「管控」方案。

延續 Brzezinski 的看法，Robert Art 在 2003 年《美國大戰略》（A

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) 書中也指出,「維持歐亞大陸國家之間的深度和平,乃美國首要之國家利益」,至於其建議則是所謂「選擇性干預戰略」,表面上,他強調的是美國應集中力量在重點目標上,但從另一角度看來,此主張不啻暗示美國已不再如過往般可以任意四處投射。事實上,Brzezinski 在 2004 年又出版了《抉擇:統治全球或領導全球》(*The Choice: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*) 一書,強調美國與以往歷史上強權所處時代環境並不相同,相較過去帝國所控制世界大多與外界隔絕,美國則霸權雖可無遠弗屆,本土卻也異常危險,更甚者,美國現今優勢終將逝去,因此它若能做到「漸進而有秩序地走下霸權地位」,將可形塑一個更具共同利益的國際社會。

必須注意的是,Brzezinski 前述帶有善意的警句,隨著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化困境,乃至全球金融海嘯爆發,美國未來地位之不確定愈發引起關注。例如 Robert Kaplan 在 2012 年《地理的復仇》(*The Revenge of Geography*) 書末,便以羅馬帝國衰落為鑑,再次提問:「美國該如何做好準備,漫長但優雅地從歷史中退出,不再擔任霸權大國?」不管從甚麼立場來看,這無疑都是攸關下一階段國際政治內涵,最關鍵亦最值得眾人深思的問題。

伍、重回世界島?

近年來,地緣政治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熱門議題,例如像是 Gerry Kearns 在 2009 年出版的《地緣政治與帝國:麥金德的遺產》(*Geopolitics and Empire: The Legend of Halford Mackinder*),抑或 Alexandros Petersen 在 2011 年的《世界島:歐亞地緣政治與西方的命運》(*The World Island: Eurasian Geopolitics and the Fate of the West*)

書中，無論其基本立場與論點如何，他們都一再提醒讀者從地理角度，去思考國際政治之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進一步來說，未來值得關注的議題包括：美國霸權的下一階段將呈現何種比例性變化？隨著美國霸權相對衰退，全球地緣結構將出現哪些真空，它們將誘發何種動盪局面？⁵至於其他若干潛在競爭者，又將如何看待此種狀態？更甚者，隨著美國能量可能之相對消退，由其接續十九世紀的英國，長達兩百年來以海權作為基礎，由外圍壓制世界島之「地緣封印」是否將跟著解除？一旦全球地緣互動核心重回世界島，屆時將呈現出何種新的結構特徵？

為探究前述一連串難題，至少盡學術研究者的一份義務，我們決定在此時推出《歐亞研究》(*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*)作為一個交流平台，希望藉此提供所有同好者一個意見交換的園地，至盼能達到腦力激盪的效果。謹以此為發刊辭與各位共勉。

⁵ 例如發跡於 2004 年之伊斯蘭國在 2013 年後陡然崛起，便與美國 Obama 政府自 2011 年起逐步從伊拉克撤軍不無關聯。

